

第二章

悲歡交錯



松竹梅

徐志摩在給梁啟超的信中曾說：「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雖然沒有明說靈魂之伴侶是誰，但很明顯，她就是林徽因。然而此時，徐志摩對愛情的追求一再受挫，林徽因已經離他越來越遠了。但是，在這愛情、友情、師生情種種感情的糾纏中，徐志摩與林徽因、梁思成、林長民、梁啟超等人並沒有心生齟齬，或者反目成仇。相反地，他們依然保持著真摯的友誼，時常聯絡，互相交流。一九三三年上半年，當徐志摩和胡適等人發起組織聚餐會時，梁思成、林徽因等都是其中的熱心人。他們在酒樓或家裡不定期地聚餐交流，暢談人生、理想、學問，互相支持，互相激勵。

是什麼把他們會聚一起，在亂世風雲中保持著那一份激情和雅興？應當是相近的家庭出身、知識文化背景、興趣愛好、品行修養讓他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他們都出身大家豪門，受過良好的中西文化相結合的教育，傳統文化功底深，又多留學歐美，接受西方近代自由主義思想，眼界開闊、思想開明，有很高的人文修養，對當時社會深感不滿，併力求在自己專長的領域，比如文學、思想、政治、建築、藝術等有所建樹，以裨益社會，促進文明的發展。

一九二三年初，由聚餐會改立的新月社在北京西單成立，林徽因、林長民等參加並表示祝賀。他們在石虎胡同租了一所房子，作為新月社的活動場所。房子根據他們的愛好，佈置得非常雅緻，他們一群人常來這裡聚會談天，讀書看報，交流思想，舉行各種文化活動，如年會、元宵燈會、古琴會、書畫會等。在女中讀書的林徽因常與表姐一起來參加，並且開始嶄露自己在文藝方面的才華。徐志摩等組織者，希望新月社能夠團結一部分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在新文藝甚至政治等方面有所貢獻，有所作為。

一九二四年，梁啟超和林長民等人主持的「講學社」打算邀請印度著名詩人、亞洲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訪華講學。梁啟超委託徐志摩籌辦接待事宜，徐志摩對泰戈爾早就心儀已久，自然熱心、認真地去做準備工作。他跟梁啟超、林長民、胡適等人反覆商量，精心設計接待活動的日程和內容。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泰戈爾一行抵達上海。徐志摩、鄭振鐸、張君勱等人親自到碼頭迎接。徐志摩作為陪同兼翻譯，帶領泰戈爾在上海、杭州等地參觀訪問。兩位詩人一見如故，成為好友。據說，在陪同泰戈爾遊覽西湖時，徐志摩詩興大發，在花下通宵達旦地吟詩、作詩。在北京的梁啟超得知此事後，專門集宋人吳夢窗、姜白石的詞句作聯一副：「臨流可奈清韻，第四橋邊，呼棹過環碧；此意平生飛動，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據說，梁啟超對此句特別滿意，認為很好地表現了徐志摩的天性。

四月二十三日，泰戈爾抵達北京。文化界名流梁啟超、林長民、胡適、蔣夢麟、梁漱溟等三百多人到車站迎接，梁思成、林徽因也參加了迎接的活動。

為了表達對泰戈爾的熱烈歡迎，梁啟超、胡適等人在日壇公園的草坪上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林徽因攙扶著白髮白鬚、身材高大的泰戈爾登上主席台，徐志摩在一旁擔任翻譯。泰戈爾做了即興演講。他首先表達了對中國人民的感謝，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中印人民團結一致，共同促進文化的發展和繁榮。徐志摩的翻譯非常成功，文采飛揚，充滿感情，演講贏得了聽眾的熱烈掌聲。

隨後，泰戈爾在北京的活動，基本上都由徐志摩做翻譯，林徽因做陪同。由於泰戈爾的大名以及徐志摩的才情，他們所到之處都受到學生和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吳詠在《天壇詩話》裡

這樣描述：「林小姐人艷如花，和老詩人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面，郊寒島瘦的徐志摩，有如蒼松竹梅的一副三友圖。」

泰戈爾的訪問由於有了徐志摩和林徽因具有了濃厚的浪漫色彩。

泰戈爾訪華的高潮是五月八日，為他六十三歲舉辦的壽筵的日子。壽筵由新月社主辦，胡適作祝壽會的主席，四百多位北京名流出席了宴會。在演說和贈禮結束之後，演出了泰戈爾的短劇《齊特拉》以助興。劇本情節將印度詩史摩訶德婆羅多的故事加以衍化而成的，內容是：馬尼浦國王生有唯一的女兒齊特拉，他想把女兒當成兒子來傳宗接代，立為儲君。她長相不美，從小被作為王子來加以訓練。當鄰國英俊的王子阿順那來到馬尼浦山中坐禪睡著時，正好被進山中行獵的齊特拉碰見，並一見鍾情。齊特拉為自己沒有女性美而苦惱，向愛神祈禱賜她美貌，即使只有一天的美麗也好。愛神便答應給她一年的美貌，使她得到了王子的愛，結為夫婦。可是不久後，王子表示敬慕那個曾經平定了盜賊的女英雄齊特拉。於是，她又祈求愛神收回所賜的美貌，在丈夫面前顯露出自己的本來面貌。

在劇中，林徽因飾演公主齊特拉，徐志摩演愛神瑪達那，林長民演春神代森塔。由於劇情浪漫，台詞華麗優美，詩意盎然，加上演員演出投入，激情充沛，演出非常成功，贏得觀眾的熱烈響應。

在陪同泰戈爾期間，由於一直與林徽因在一起，徐志摩壓抑的感情再度燃燒起來。他尋找種種適合的場合表達自己的愛意，但林徽因都裝作視而不見。無奈之下，徐志摩懇求泰戈爾為之求情，說自己仍然愛著林徽因，無法壓抑自己的愛情之火。泰戈爾無奈之下，只好說凌叔華比林徽因有過之而無不及。

此事在當時被傳得沸沸揚揚，自然引起了林梁兩家的注意。尤其是梁啟超的夫人李蕙仙和女兒梁思順對林徽因極為反感，認為她有辱門庭，不配做梁家的兒媳。兩難之中的林徽因非常苦惱，她同情徐志摩，但對他早已下定了決心，只當做朋友，決不越過雷池，但是現在卻被親人誤解，連申訴的機會都沒有。梁思成也很痛苦，梁啟超說：「思成和徽因，去年便有幾個月在刀山劍樹上過活，這種地獄比城隍廟十王殿裡畫出來還可怕，因為一時造錯了一點業，便受如此慘報，非受完了不會轉頭。」

對這一段時期的情形，梁從誠後來這樣描述：

在去英國之前，母親就已認識了當時剛剛進入「清華學堂」的父親。從英國回來，他們的來往更多了。在我的祖父梁啟超和外祖父看來，這門親事是頗為相當的。但是兩個年輕人此時已經受到過相當多的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不是順從於父輩的意願，而確是憑彼此的感情而建立起親密的友誼的。他們之間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珍愛和對造型藝術的趣味方面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許多差異。父親喜歡動手，擅長繪畫和木工，又酷愛音樂和體育，他生性幽默，做事卻喜歡按部就班，有條不紊；母親富有文學家式的熱情，靈感一來，興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顧其他，有時不免受情緒的支配。我的祖母一開始就對這位性格獨立不羈的新派的未來兒媳不大看得慣，而兩位熱戀中的年輕人當時也不懂得照顧和體貼己身患重病的老人的心情，雙方關係曾經搞得十分緊張，從而使母親又逐漸捲入了另一組家庭矛盾之中。這種局面更進一步強化了她內心那種潛在的反抗意識，並在後來的文學作品中有所反映。

梁啟超對兒女較能理解，但理解歸理解，為了避免意外發生，加上原本就打算今年讓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赴美留學，梁啟超便和林家商定，立即讓他們倆動身赴美，待完成學業後再結婚。對於徐志摩來說，這意味著追求林徽因的機會也許再也沒有了。這的確是個殘酷的打擊。對此，老友林長民很清楚。他認為，應該和自己的這位忘年交好好談談，而且這也應是他們之間最後談這個話題了。

在一個月色美好的夜晚，林長民約徐志摩泛舟遊湖，這是一次長談。林長民告訴徐志摩，林徽因和梁思成不久將一起赴美留學，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林長民還說了很多，但徐志摩只知道他要與林徽因分別了，他只記得那個夜晚的月色異常淒迷。

沒過幾天，林徽因和徐志摩也見面談了談，她的態度沒有變，他們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每人有自己的方向，他們只能互相祝福。大概，這就是所說的緣分。徐志摩的一首〈偶然〉對此做了優美而感傷的詮釋：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毋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林徽因後來也用詩〈那一晚〉道出了自己的心聲：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藍的天上托著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牽著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鎖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兩人各認取個生活的模樣。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飄，
細弱的桅桿常在風濤裡搖。
到如今太陽只在我背後徘徊，
層層的陰影留守在我周圍。
到如今我還記著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淚、白茫茫的江邊！
到如今我還想念你岸上的耕種：
紅花兒黃花兒朵朵的生動。
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頂層，
蜜一般釀出那記憶的滋潤。
那一天我要跨上帶羽翼的箭，
望著你花園裡射一個滿弦。
那一天你要聽到鳥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靜候著你的讚賞。
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亂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闖入當年的邊境！

五月二十日傍晚，徐志摩陪同泰戈爾赴太原，在火車站，來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人群裡看著他們離開。離別總是讓人傷感，想到多日來陪在自己左右、年輕可愛的林徽因，泰戈爾也黯然。他特意為她做了一首詩：

蔚藍的天空，
愛上了碧綠的大地，
他們中間的清風歎了一聲「唉！」

火車開動，俯在車窗的徐志摩看到林徽因優美的身影越來越模糊，痛苦至極。他知道，待到回來時，林徽因很可能已經同梁思成比翼雙飛，遠赴美國了。而自己，只落得個形單影隻，心痛的感覺讓他難以忍受，他趕緊掏出筆，寫道：

我真不知道我要說的是什麼話，我已經好幾次提起筆來想寫，但是每次總是不成篇。這兩日我的頭腦總是昏昏沉沉的，閉著眼閉著眼卻只見大前晚模糊的月色，照著我們不願意的車輛，遲遲的向荒野裡退縮，離別！怎麼能叫人相信？我想著了就要發瘋。這麼多的絲，誰能割得斷？我的眼前又黑了……



留學美國

一九二四年七月，林徽因、梁思成到達美國康乃爾大學，在該校入暑假預修班。林徽因選了戶外寫生和高等代數兩門課，梁思成選了水彩靜物畫、戶外寫生和三角三門課，他們希望預修一些學分後，到賓夕法尼亞大學直升建築系二年級或更高的年級。

康乃爾是美國東部常春藤名校，依山傍水，景色秀美。梁思成在給家裡的信中說「這裡山明水秀，美如仙境」，他們的學習自然十分用功，但卻又遇到了難以排解的苦惱。

此時，梁思成不時收到姊姊梁思順的來信，信中談到她與母親怎麼反感林徽因，堅決反對他們倆結婚。她們的態度十分堅決，讓梁思成異常苦惱。梁啟超也感到了事態的嚴重，他說：「這是思成一生幸福的關鍵所在，我幾個月前就很怕思成因此生出精神異動，毀掉了這孩子。」

對此，林徽因自然感到非常委屈，覺得自己並沒有做錯。雖然是身正不怕影子斜，但這些事還是讓她精神憂鬱，以至於生病。好在梁思成明白事理，懂得林徽因的苦衷，還十分體貼，這讓林徽因感到欣慰，認為自己並沒有選錯人。但是，夾在中間的梁思成擔心母親和姊姊不能聽從勸告，難以轉變對林徽因的態度，這讓他深感苦惱。他在給姊姊的信中說：「感覺著做多少事，便受多少懲罰，非受完了不會轉過來。」

還好，這時也在美國留學的弟弟梁思永頗為理解他們。他一再寫信給姊姊梁思順，要她理解林徽因，還寫信給父親，懇求他勸說姊姊和母親。因而到了一九二五年四月，梁思順對林徽因的態度有所改變，甚至「感情完全恢復」，梁啟超知道後，非常高興。

這時，又一件壞消息傳到美國。梁思成母親的癌症到了晚期，家裡已經開始為她準備後事。梁啟超發電報給梁思成，要他回國盡一個兒子應盡的義務，但思成剛入學不久，一切都還沒有頭緒，難以確定何時動身，由此以來，他和林徽因終日黯然神傷，內心十分痛苦。

一九二四年九月，梁思成和林徽因進入美國賓州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二〇年代的賓大建築系是布雜藝術的堡壘，坐鎮的是系主任、法國著名建築師克雷（Paul P.Cret，一九七六一—一九四五年）。這位著名的建築師把他的一生所學傳授給了他的美國學生，在賓大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他們卻聽到一個令人不安的消息，建築系只收男生，打聽到的原因是，建築系學生常常要徹夜趕圖，而無人陪伴的女生不太方便。林徽因沒有辦法，只好和其他女生一起在美術系註冊。本來是林徽因一直想上建築系，才拉著梁思成和他們的朋友陳植來到賓大，結果她自己反而上不了，這讓林徽因感到懊惱。事實上，她並不肯就此妥協，大學檔案顯示，自一九二六年春季班開始，林徽因已是建築系設計教授的助理，而下學期又當上了建築設計課的輔導員。

她究竟是怎麼辦到的？如何打破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規定？這點我們不得而知。反正從第一年開始，她就和梁思成一起上建築課了。建築系的一位年輕講師、日後成為著名建築師的哈貝森，曾經誇獎他倆的建築圖作業簡直「無懈可擊」。

上大學的頭一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之間經歷了一番感情的掙扎，有時甚至爆發激烈的爭吵。他們倆的個性和脾氣差異比較大，在婚前的這段時期，彼此仍有待調適。

在美國同學眼裡，中國來的留學生多半刻板、僵化，而「菲麗絲」（這裡的人都這麼叫林徽因）除外。她有著異乎尋常的美貌、活潑和機靈，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且又天生善於交際，因而得到大家的喜愛。

但是梁思成真是那麼刻板、死硬嗎？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嚴肅用功的學生，他一輩子都是如此，這是他的天性。在梁思成的心目中，他和林徽因是一種「沒有正式訂婚」的親密關係，覺得對她有責任而想管管她。但林徽因在美國的文化環境中如魚得水，她正在充分享受美國的自由，在男女同學裡受到的歡迎令人陶醉。所以當梁思成因為愛她，有時想約束一下她時，林徽因常常付之一笑。梁思成對林徽因非常體貼，而且很有耐心。據說，每次約會，梁思成都要在女生宿舍下面等二十、三十分鐘，林徽因才打扮好，矻矻下樓。因而，梁思永曾為他們撰寫了一副對聯：「林小姐千裝萬扮始出來；梁公子一等再等終成配。」橫幅是「誠心誠意」。

不過，他們還是盡量在不壓抑自己個性的條件下，相互容忍和妥協。大學時代，他們性格上的差異，從工作態度上便可看出。滿腦子都是創意的林徽因，常常先畫出一張草圖或建築圖樣，然後一邊做，一邊修正或改進，而一旦有了更好的點子，前面的便一股腦兒丟開。等到交圖的最後期限將到，即使在畫圖版前不眠不休趕工也來不及了，這時候梁思成就插進來，以他那準確和熟練的繪圖工夫，把那亂七八糟的草圖變成一張整潔、漂亮、能夠交卷的作品。他們倆合作無間，各為建築貢獻出自己的特殊天賦。

對於林徽因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生活的其他細節，我們可以從她的一位美國同學一九二六年寫的一篇文章中瞭解一、二：

她坐在靠近窗戶能夠俯視校園中一條小徑的椅子上，俯身向一張繪圖桌，她那瘦削的身影匍匐在那巨大的建築習題上，當它同其他三十到四十張習題一起掛在巨大的判分室的牆上時，將會獲得很高的獎賞。這樣說並非捕風捉影，因為她的作業總是得到最高的分數或偶爾的第二。她不苟言笑，幽默而謙遜。從不把自己的成就掛在嘴邊。

美國民主、自由的文化環境讓林徽因感到幸福，她在這樣的環境裡，盡情的施展自己的個性，揮灑自己的才華：

我曾跟著父親走遍了歐洲。在旅途中我第一次產生了學習建築的夢想。現代西方的古典建築啓發了我，使我充滿了要帶一些回國的慾望。我們需要一種能使建築百年不朽的良好建築理論。

然後我就在英國上了中學。英國女孩子並不像美國女孩子那樣一上來就這麼友好。她們的傳統似乎使她們變得那麼不自然地矜持。

開始我的姑姑阿姨們不肯讓我到美國來。她們怕那些小野鴨子，也怕我受她們的影響，也變成像她們一樣。我得承認剛開始的時候我認為她們很傻，可是後來當我已看透了表面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她們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在中國一個女孩子的價值完全取決於她的家庭。而在這裡，有一種我所喜歡的民主精神。



父親的死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梁思成和林徽因收到梁啟超發來的一封急電和一封長信。信中寫道：

今天報紙上傳出可怕的消息，我不忍告訴你，又不能不告訴你，你要十二分鎮定著，看這封信和報紙。

我們總還希望這消息是不確的，我見報後，立刻叫王姨入京，到林家探聽，且切實安慰徽因的娘……我現在總還存萬一的希冀，他能在亂軍中逃命出來。萬一這希望得不著，我有些話切實囑咐你。

第一，你自己要十分鎮靜，不可因刺激太劇，致傷自己的身體。徽因遭此慘痛，唯一的伴侶，唯一的安危，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鎮靜著，才能安慰她，這是第二層。

第二，這種消息，諒來瞞不過徽因。萬一不幸，消息若確，我也無法用別的話解勸她，但你可以將我的話告訴她：我和林叔的關係，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兒，就是我的女兒，何況更加以你們兩個的關係。我從今以後，把她和思莊一樣看待她，在無可慰藉之中，我願意她領受我這種十二分的同情，度過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氣，發揮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學習，將來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國藝術界有點貢獻，才不愧為林叔的好孩子。這些話你要用盡你的力量來開解她。……

徽因留學總要以和你同時歸國為度。學費不成問題，只算我多一個女兒在國外留學便了，你們不必因此著急。

不久，他們又收到梁啟超的來信：

昨晚彼中脫難之人，到京面述情形，希望全絕，今日已發喪了。遭難情形，我也不必詳報，只報告兩句話，（一）系中流彈而死，死時當無大痛苦。（二）遺骸已被焚燒，無從運回了。……徽因的娘，除自己悲痛外，最掛念的是徽因要急煞。我告訴她，我已經有很長的信給你們了。徽因好孩子，諒來還能信我的話。我問她還有什麼話要我轉告徽因沒有？她說：「沒有，只有盼望徽因安命，自己保養身體，此時不必回國。」我的話前兩封信都已說過了，現在也沒有別的話說，只要你認真解慰便好了。

這封信確定了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在不久前的戰亂中不幸去世。

事實經過是這樣的。一九二五年，軍閥張作霖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兵分四路進攻北平，意欲打敗華北軍閥，自任總統，統治全中國。十一月，郭松齡將軍向全國發表〈反奉通電〉，不久將原奉軍第三方面軍改稱東北國民軍，起兵反奉，打倒軍閥，制止內戰，誓死救國。林長民當時應邀參加郭松齡幕府，擔任政務處長。郭松齡將軍這一舉動是愛國的，進步的，立即受到共產黨的〈嚮導〉和全國輿論界的肯定，而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高校學生則通過集會、遊行予以聲援。

反奉戰爭之初，郭松齡部隊士氣旺盛，接連攻下山海關、連山和錦州。可是，當郭部於十二月二十一日發起總攻擊時，卻由於張作霖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調集大批部隊反攻，而郭部內部卻出現了叛徒，因而情勢大變，郭部慘敗。郭松齡只好率領一部分人馬突圍奔逃，逃至新民縣西南的蘇家窩棚時，受到奉

軍王永清的騎兵襲擊，結果和郭松齡同行的林長民中流彈身亡。郭松齡及其夫人韓叔秀藏於某一居民菜窖中，但由於叛徒出賣被搜出，押往遼中縣老達鎮，二十五日被槍殺。

林徽因得此噩耗後，悲痛萬分，大哭不已。她與父親的感情非同一般，她是父親最疼愛的孩子，她對父親的敬愛遠遠超過了母親。年僅四十九歲的父親竟然就此撒手人寰，怎能不叫人傷心欲絕？家裡僅有三百塊積蓄，母親和弟妹怎麼生活？想到這些，林徽因恨不能立刻回國。這時梁啟超又發來一封電報，告知家裡的事他可以幫忙處理，不用她擔心，只需她節哀，好好注意身體，繼續在美國求學。梁思成也一再勸阻，林徽因終於沒有回去，但心裡難過至極，整天以淚洗面，很快病倒在床。好在有梁思成無微不至的照顧，她才得以度過難關。



沒有什麼比父親的死更讓林徽因難過了，熬了很多天，她終於挺了過來。但一九二六年十月間，她收到了梁思順轉來的梁啟超寫的一封信。這封信又讓她心煩意亂起來。梁啟超說：

我昨天做了一件極不願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證婚。他的新婦正是王受慶夫人，與徐志摩戀愛上，才和受慶離婚，實在是不道德之極。我屢次告誡志摩而無效。胡適之、張彭春苦苦為他說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情。我在禮堂演說一篇訓詞，大大教訓一番，新人及滿堂賓客無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聞之婚禮矣。今把訓詞稿子寄給你們一看。青年為感情衝動，不能節制，任意決破禮防的羅網，其實乃是自投苦惱的羅網，真是可痛，真是可憐！徐志摩這個人其實聰明，我愛他不過，此次看著他陷於滅頂，還想救他出來，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們對於他這番舉動無不深惡痛絕，我想他若從此兇擯與社會，固然自作自受，無可怨恨，但覺得這個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殺。我又看著他找得這樣一個人做伴侶，怕他將來苦痛更無限，所以想對於那個人當頭一棒，盼望他能有覺悟（但恐甚難），免得將來把徐志摩累死，但恐不過是我急癡的婆心便了。聞張歙海近來也很墮落，日日只想做官（志摩確是很高潔，只是發了戀愛狂——戀態心理——戀態心理的犯罪）。此外還有許多招物議之處，我也不願多講了。品性上不曾經過嚴格的訓練，真是可怕，我因昨日的感觸，專寫這一封信給思成、徽因、思忠們看看。

梁啟超所說的「證婚」，是指他給徐志摩和陸小曼做證婚人。一九二四年秋，在新月社的活動中，徐志摩結識京師名媛陸小曼，兩人很快墜入愛河。

陸小曼是美西點軍校畢業的高材生王廣的妻子，容貌美麗，喜歡交際，對徐志摩的才情很是傾慕，而徐志摩也為她的風情所迷倒。兩人經歷一番曲折後，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在北京結婚，並請梁啟超做證婚人。本來梁啟超不願意做，無奈胡適再三勸說，最後只好答應。然而，令徐志摩大吃一驚的是，在婚禮上，梁啟超對他和陸小曼二人大加訓斥：

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你這個人用情不專，以致離婚再娶。以後務要痛改前非，從新做人！

徐志摩、陸小曼，你們聽著！你們都是離過婚，又重新結婚的，都是過來人！這全是由於用情不專，以後要痛自悔悟，希望你們不要再一次成為過來人。我作為你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還認我為先生的話——又作為今天這場婚禮的證婚人，我送你們一句話，祝你們這是最後一次結婚！

徐志摩還沒聽完就面紅耳赤，十分難堪，而陸小曼則因突如其來的訓斥快要暈倒。後來多人勸說，梁啟超才作罷。

一九二七年一月，胡適為完成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後手續再次赴美。到達美國不久，他便收到林徽因寄來的信，邀請他去費城彭校教育會演講。林徽因的主要目的是想與胡適談談，以瞭解國內的一些情況。她寫道：「我這兩年多的渴想北京和最近殘酷的遭遇給我許多煩惱和苦痛。我想你一定能夠原諒我對於你到美的踴躍。我願意見著你，我願意聽到我所狂念的北京的聲音和消息，你不以為太過吧？」

胡適應約前來會見林徽因。談話中必然談及徐志摩和陸小曼。對於他們的婚事，胡適一開始也不很同意。可是後來看到他們倆愛得你死我活，歷盡艱難，因而十分同情和理解。

對於徐志摩結婚，林徽因的心情還是很複雜，很微妙。她在三月份給胡適的信中說：「那天所談的一切——宗教、人事、教育到政治——我全都忘不了的尤其是『人事』。一切的事情我從前不明白現在已清楚了許多，就還有要說要問的也就讓他們去不說不問了。『讓過去的算過去的』這是志摩的一句現成話。」她還說：「回去時看見朋友們替我問候，請你告訴志摩我這三年來寂寞受夠了，失望也遇多了，現在倒也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著自慰和滿足。告訴他我絕對地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諒我過去的種種的不瞭解。但是路遠隔膜誤會是所不免的，他也該原諒我。我昨天把他的舊信一一翻閱了，舊的志摩我現在真真透徹的明白了，但是過去，現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遠紀念著。」

林徽因說得有些傷感，這也見出她對徐志摩感情之深厚。有些事情，只有過去了才明白它的意義，有些人真正地失去了，才覺得傷心，才覺得重要。

對於自己的現在和未來，林徽因還跟胡適做了詳細的描述。她在信中說：「如你所說的，經驗是可寶貴的，但是有價值的經驗全是痛苦換來的，我在這三年中真是得了不少閱歷但也夠苦了。經過了好些的變動的環境和心理我是如你所說的老成了好些，換句話說便是會悟了從青年的idealistic phase（理想主義階段）走到了成年的realistic phase（現實主義階段），做人便這樣做罷。Idealistic的夢停止了也就可以醫好了許多vanity（虛榮）這未始不是個好處」，「照事實上看來我沒有什麼不滿足的」。

這是對自己心境的準確描繪。由這段話可以看出，經歷了這麼多的變故，少女時代的林徽因已經逐漸遠去，迎面走來的，是一位成熟、現實的女性。

儘管遭受這麼多的打擊，忍受了這麼多的煎熬，林徽因絲毫沒有放鬆自己的學業。一九二七年二月，林徽因以優異成績獲得美術學士學位，提前一年完成學業。而梁思成則於二月獲得建築學學士學位。這年夏天，克雷請他們當助手，從事建築設計和研究，這是對他們最大的肯定和鼓勵。

暑假過後，林徽因進入耶魯大學戲劇學院，在C.P.貝克教授的工作室學習舞台美術。據說，林徽因是中國第一位到國外學習舞美專業的學生，之所以學這個專業，因為林徽因既喜歡美術，又非常愛好戲劇。早在一九二五年，聞一多等人組織「中華戲劇改進社」時，她就是主要成員之一。梁思成為了研究東方建築，轉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攻讀碩士學位。

到一九二八年初，梁思成達到了他來哈佛的目的。而此時的林徽因則以她慣有的活力，在耶魯大學戲劇學院的舞台設計者中贏得了一個特殊的位置。由於在建築設計和繪圖方面的高超技術，在交卷期限逼近時，她成為每一位同學的救星。

史都華·錢尼，當時尚未滿二十歲，也是林徽因疼愛的小學弟，日後在舞台設計上嶄露頭角。八年之後，即一九三六年二月，林徽因在《戲劇藝術月刊》上發現他的名字，驚喜地寫道：「我的錢尼真了不起，現在成了百老匯的設計師！想想看，那個和誰都合不來、老是需要我像母親般保護的小淘氣，現在成了百老匯有名的設計師，一次就有四部劇目同時上演。」

學業即將完成，也該準備婚事了。對此，比他們倆更關心的是

他們的父親梁啟超。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梁啟超與林家商定十八日為他們舉行定婚儀式。梁啟超在信中说：

這幾天家裡忙著為思成行文定禮，已定於十八日在京寓舉行，因婚禮十有八九是在美舉行，所以此次和文定禮特別莊嚴慎重些。晨起謁祖告聘，男女兩家皆用全貼遍拜長親，午間宴大賓，晚間家族歡宴。……

聘物我家用玉珮兩方，一紅一綠，林家初時擬用一玉印，後聞我家用雙佩，他家也用雙印，但因刻玉好手難得，故暫且不刻，充其太璞。禮畢擬將兩家聘物匯寄坎京，備結婚時佩帶，惟物品太貴重，深恐失落，即仍留兩家家長處，結婚後歸來，乃授與保存。

十二月十八日，梁啟超又來信說及舉行婚禮的事宜：

這幾天為你們的聘禮，我精神上非常愉快，你想從懷抱裡「小不點點」，一個孩子盼到成人，品行學問都還算有出息，眼看這就要締結美滿的婚姻而且不久就要返國，回到懷裡，如何不高興呢？……

我主張你們在坎京行禮，你們意思如何？我想沒有比這樣再好的了。你們在美國兩個孩子自己實張羅不來，且總覺太草率，有姊姊代你們請些客，還在中國官署內行謁祖禮（婚禮還是在教堂內好），才莊嚴像個體統。

婚禮只要莊嚴不要侈靡，衣服首飾之類，只要相當過得去便夠，一切都等回家再行補辦，寧可節省點錢作旅行費。

你們由歐洲歸國行程，我也盤算到了。……我替你們打算，

到英國後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歐極有特色，市政亦極嚴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築上最有意思者為南美諸國，可惜力量不夠供此游，次則北歐可觀），必須一往。由是入德國，除幾個古都市外，萊茵河畔著名堡壘最好能參觀一二，回頭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義大利，多耽擱些日子，把文藝復興時代的美，徹底研究瞭解。最後便回到法國，在瑪賽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劉子楷在那裡當公使，招待極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歐洲文化實以西班牙為中心。）中間最好能騰出點時間和金錢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築和美術，附帶著看看土耳其革命後政治。（關於這一點，最好能調查得一兩部極簡明的書〔英文的〕回來講給我聽聽。）

梁啟超對兒女的事情可謂關心備至，更何況他此時已經重病在身。真是天下父母心！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行婚禮。據說，選擇這個日子，是為了紀念宋代傑出建築師李誡，因為三月二十一日是他的墓碑上唯一的日期。由於林徽因不願在教堂舉行宗教式的婚禮，因而，他們在中國駐加拿大總領事夫人梁思順家的客廳裡舉行了結婚儀式（當時，梁思順的丈夫周希哲是領事）林徽因不願意穿西式的白紗婚禮服，但又沒有中式「禮服」可穿，她便以構思舞台服裝的想像力，自己設計了一套「東方式」帶頭飾的結婚服裝，據說曾使加拿大新聞攝影記者大感興趣，這可以說是她後來一生所執著追求的「民族形式」的一次創作。

婚禮由姊姊和姊夫主持，中外來賓很多，場面非常熱鬧，但又不俗氣。林徽因和梁思成都很滿意，但也滿是感慨。從

一九一八年兩人相識，到一九二八年結婚，整整十年的時間，也算是一路坎坷。對於林徽因來說，這麼喜慶的日子裡，想到浪漫瀟灑、充滿豪情的父親已離開人世，不能不讓人傷心。

婚後，他們倆立即寫信給梁啟超，詳細告知婚禮的舉行情況。梁啟超收到信後，滿心歡喜，很快回覆他們，表示祝賀，並訴說自己的喜悅和期望。他說：

老人欣悅情懷可想而知。尤其令我喜歡者，我以素來偏愛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兒，其可愛與我原有的女兒們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極愉快的一件事。你們結婚後，我有兩件新希望：頭一件你們倆體子都不甚好，希望因生理變化作用，在將來健康上開一新紀元。第二件你們倆從前都有小孩子脾氣，愛吵嘴，現在完全成人了，希望全變成大人樣子，處處相互體貼，造成終身和睦安樂的基礎。這兩件希望，我想總能達到的。

不久，他們按照梁啟超的安排，動身去歐洲旅遊，這既是度蜜月，也是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

雖然林徽因當年曾經跟隨父親在歐洲的主要國家遊歷了一番，但那時年紀尚小，加上學識有限，時間倉促，只是走馬看花，匆匆瀏覽。這次有梁思成做伴，兩人又對建築史已經有相當的瞭解，因而興致很高，收穫頗多。新婚的幸福，加上學業上的收穫，使這對新人在歐洲精美的古建築中流連忘返。

多年以後，林徽因仍然記得參觀西班牙達格拉納達市阿爾罕布拉宮時的情形。林徽因說，她與梁思成到達拉納達市時已是午後四點，在旅館安頓下來後已過五點，沒有旅遊車可乘了，只好自己包了一輛馬車前往阿爾罕布拉宮。到達後，宮門已關

閉。只好央求管理人員讓他們參觀。她看到的阿宮是這樣的：

坐落在一個地勢險要的小山上，有一圈紅石圍牆。圍牆的大門叫公正門。整個宮殿以兩個互相垂直的長方形殿堂組成，南北向的叫石榴院，東西向的叫獅子院。石榴院南北兩端有券廊，正殿在北端券廊的後面，院子中央有一條長水池。獅子院北側是后妃的臥室，後面有小花園，有山泉水，在院子中央匯成一小池，池周邊欄板上雕著十二個雄獅雕像。獅子院有一圈柱廊。阿宮的殿堂及券廊上的壁畫有許多幾何紋樣和阿拉伯文字的圖案。整個宮殿的藝術風格精緻，絢麗，柔靡，憂鬱，親切。

遊覽了法國、英國、瑞士、義大利、西班牙和德國後，這對年輕的夫婦接到父親的來信，要求他們提前回來。一九二八年初夏時節，為了節省時間和費用，他們取道莫斯科，通過西伯利亞大鐵路回國。歸國途中，他們遇到了一對年輕的美國夫婦——查里斯和芙瑞莉卡·查爾德。共同的氣質和愛好使他們很快成為好朋友，成為旅途愉快的伴侶。一九八〇年，查里斯應林徽因夫婦的好友費慰梅的要求，回憶了當年他們的交往：

人生的際遇中，有時出現神奇（不再重複出現）的片段或插曲。我們和梁氏夫婦短暫而熱烈的友誼就是如此——一扇敞開、通向共同懂憬的大門。

一九二八年初夏，芙瑞莉卡和我搭上一列穿越西伯利亞的火車，從莫斯科緩緩東行，列車沿途停下，加水或添木頭燃料。靠站時，旅客都跑到站台上，上下走動，向當地人換東西吃或者泡茶。

在那些粗魯的、發臭的旅客群中，這一對迷人的年輕夫婦

顯得特別醒目。除了天生的沉靜外，在我們眼裡，他們彷彿反映著一種不可抗拒的光輝和熱情。在相互愉悅的心情下，我們很快談起話來——他們說，他們是滿載著美國的體驗回去，急於把它們付諸實踐，而我們則是剛開始展開長長的、通往深深吸引我們的藝術和哲學的旅程。驀然回首，火車旅行的單調和語言障礙，顯然也是增進彼此友誼的因素。

但是誰又能「說清楚」，好感，它就這麼來了——與對方同行，分享著共同的觀念、計劃和志向，我們感到歡喜。

火車顛簸前行，經過鄂姆斯克、托木斯克、伊爾庫茨克、貝加爾，一個又一個的站，最後抵達和中國中東路的接軌站，四人一行從那裡登上往東南穿過滿洲的火車，經過哈爾濱、瀋陽，來到黃海邊的大連。

我們在瀋陽停下，拜訪一座沿大街陳列著石刻侍衛的古老大圖書館。思成的父親在那裡有熟人，當我們走過書法和繪畫的珍藏展時，「梁」這個姓氏，引來無數的打躬作揖。

我們從大連登上一艘日本輪船橫渡直隸灣，駛往天津的外港大沽口。日光淡了，大雨傾瀉如注，又換搭一列既緩慢又漏雨的火車前往北京。車頂上坐滿了搭霸王車的旅客。儘管如此，雨水還是漏進來，落在我們用報紙折成的帽上，淋濕了座位靠背上點著的蠟燭。就這樣到了北京，一個鼻孔裡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個鼻孔裡是糞臭，夾雜著人力車伕和乞丐的叫喊聲，在吵吵嚷嚷中來到了這座夢寐以求的古都。

在北京，梁氏夫婦成了我們忠實的導遊。從景山到天壇，從玉泉塔到西山，參觀了各式飯館、戲院、街市、店舖，甚至一探梁老先生有圍牆的私家花園，溜進叔叔阿姨豪華宴會，會場設在養著小鳥、夏日花卉，有水池、樹木的內院裡。紫禁城裡一間又一間、空當寂靜的房間和冷然無聲的庭院。一切都呈現在眼前，夾雜著熱切和慇懃。

走過北海、孔廟以及那些著名勝地，在殘存的輝煌中我們分享彼此的心聲，漸漸地明白，他們歸來已感到一種震驚和失望。他們說，顯然不管受了多少教育，在祖國目前混亂和變動的情況下，他們很難（甚至不可能）使得上力，或有任何影響力。（由於要和官僚作風和漠然態度迎面相撞，在戲劇和建築方面新舊融合的問題，似乎很難克服。儘管如此，他們依然「堅持！堅持！」）

又是那種玩世不恭和屢遭挫折的感覺油然而生。這時候我們就堅持，儘管我們懷疑和無知，這終究是一個變革的時代，從長遠來看，一切都會轉好。儘管如此，我們的朋友顯然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對溫克爾（Rip Van Winkles，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作品〈見聞雜記〉中的主角，喻指和時代、環境格格不入的人）。他們回到突然間變得不熟悉而混亂的祖國，然而，他們還是決心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把他們的新技能和創造力貢獻給雜亂無章的環境。有時他們充滿田園詩般的憧憬，大半時候卻只有懷疑。

菲麗絲感情豐沛，愛開玩笑，對任何事都很堅持，走到哪兒都惹人注目。思成則是溫文爾雅、有幽默感，神情愉快，對古代公共建築、橋樑、城牆、店舖和民居的任其損

壞或被破壞的現象，表示深惡痛絕。他們倆人是完美的組合……一種氣質和技巧的平衡，即使在早年，似乎也看出兩人合為一體，比各自分散所得成果要大得多——一種罕有的奇蹟的配合。

依我們看來，在那軍閥土匪當道的混亂年代，即使以他們的才能和優越的社會地位，在中國社會的大漩渦裡似乎也將消逝得無影無蹤。他們的傳奇故事到此暫告一段落，我們必須離開，到京都去，此後彼此沒再見過面。





白山黑水

在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歐洲盡情遊覽的時候，梁啟超已開始為他們回國後的工作作打算。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梁啟超在給他們的信中寫道：

你們回來的職業，正在向各方面籌劃進行（雖然未知你們自己打何主意），一是東北大學教授（東北為勢最順，但你們去也有許多不方便處，若你能得到清華，徽因能得燕京，那是最好不過了），一是清華學校教授，成否皆未可知……以徽因現在的境遇，該迎養她的娘才是正辦……但現在覓業之難，恐非你們意想所及料，所以我一面隨時替你們打算，一面願意你們先有這種覺悟，縱令回國一時未能得相當職業，也不必失望沮喪。失望沮喪是我們生命上最可怖之敵，我們須終身不許它侵入。

但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回信中卻沒有同父親談到工作的打算，這讓梁啟超有些不滿，在給女兒梁思順的信中說：

關於思成職業問題，你的意見如何？他有點胡鬧，我在幾個月以前，已經有信和他商量，及此他來信一字不提（根本就來信太少），因此我絕不知他打何主意，或者我所替他籌劃的事，他根本不以為然，我算是白費心了。這些地方，他可謂少不更事，朋友們若是關心自己的事，替自己籌劃，也應該急速回信給他一個方針，何況尊長呢？（他不願以自己的事勞動我的思慮，也是他的孝心，但我既已屢屢問及他，總要把他的意旨所在告訴我才是。）你去信關於這些地方，該應責備他，教導他一下。

儘管如此，梁啟超還是不顧自己身體有病，盡力為他們尋找一份合適的工作。五月十三日，他在給梁思順的信中說：

思成職業問題，居然已得到解決了。清華及東北大學皆請他，兩方比較，東北為優，因為那邊建築事業前途極有希望，到彼後便可組織公司，從小規模辦起，徐圖擴充，所以我不等他回信，還替他做主辭了清華（清華太舒服，會使人懶於進取）……但既已應聘，九月開學前須到校，至遲八月初要到家。

八月十八日，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到北京。見到闊別數年的親人，自是喜極而泣，感慨萬千。梁啟超一直懸著的一顆心也可以放下來了。他在給女兒的信中說：

新人到家以來，全家真是喜氣洋溢。初到那天看見思成那種風塵憔悴之色，面龐黑瘦，頭筋漲起，我很有幾分不高興。這幾天將養轉來，很是雄姿英發的樣子，令我越看越愛。看來他們夫婦體子都不算弱，幾年來的憂慮，現在算放心了。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靚熟，不解作從前舊家庭虛偽的神容，又沒有新時髦的討厭習氣，和我們家的孩子像同一個模型鑄出來。

回家不久，這對新婚夫妻便按照傳統習俗，到北京西山拜謁母親李蕙仙之墓。在家休息了大約十來天，梁思成便趕往位於瀋陽的東北大學。東北大學建於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六年張學良任校長後，把原有的文、法、理、工四個學科，改為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和工學院，在工學院設建築系，這是我國最早的一個建築系，梁思成被聘為系主任。

此時，林徽因回福建探望孤苦的母親。其間，曾應邀在烏石山第一中學和倉前山英華中學分別作了題為〈建築與文學〉和〈園林建築藝術〉的演講。之後，她又匆忙趕到東北大學，與梁思成會合。

第一學年，建築系只有他們夫婦倆，教四十多名學生，任務比較繁重。梁思成教建築設計和西洋與中國建築史，林徽因則負責教美術課和建築設計，她的課妙趣橫生，加上她對學生非常關心，儘管當時已懷有身孕，但還是常常輔導學生到深夜，故非常受學生歡迎。

就在他們的事業剛剛有所起色的時候，父親梁啟超的病已經非常嚴重了。梁啟超的身體一直都還不錯，向來都是家裡最權威的主人，做一切重要的決定。正因為意識到家裡一切全靠他拿主意，他便隱瞞了一九二八年春天的時候尿中有血的問題。梁啟超意識到了其中的危險，去北京德國醫院檢查，但醫生告訴他沒有發現什麼惡化徵兆。出院以後他堅持用中醫治療，但沒有什麼效果。後來他又到北京協和醫院去做檢查，經過化驗，醫生診斷有一個腎發生病變，便動了切除手術。然而，手術後，梁啟超的尿中還是有血，醫生便懷疑他有肺病，後來又說牙齒出血，連續拔掉七顆牙齒後，病仍未得到治療，一路下來，梁啟超被折騰得元氣大傷。

得到父親病重的消息，林徽因和梁思成等學校一放假，便立即趕回北平，下車後直奔醫院。看到一向精力充沛，目光炯炯有神的父親臉色蒼白，形容枯槁，好像一下子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夫婦倆頓時淚如雨下。躺在床上的梁啟超無力地抬抬眼睛，微弱的眼神裡透出些許欣慰，對於兒女，他的責任已經盡到了。

不久，梁啟超的病情繼續惡化，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這時，剛從歐洲回到上海的徐志摩得知恩師病危，立即趕往北平探視。梁思成告訴他，由於病情十分危險，醫生禁止親人探視。徐志摩只好從門縫中看了老師最後一眼。看到曾經神采飛揚、談笑風生、指點天下的老師病得只剩下皮包著骨頭，徐志摩痛哭失聲。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下午，一代風雲人物梁啟超病逝，噩耗傳開，震動全國。各界名流都前來祭悼，家人傷心欲絕。

梁啟超與夫人李蕙仙合葬於北平西山臥佛寺西東溝村，墓碑是梁思成和林徽因設計的，高二點八公尺，寬一點七公尺，樸素莊重，上面鐫刻著：「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這是他們倆的第一件作品。

四十多年後，即一九七一年，梁思成從醫生那兒得知父親早逝的真相。據當時參加手術的兩位實習醫生說：「病人被推進手術室後，值班護士用碘在肚皮上標位置，結果標錯了地方。劉博士就動了手術（切除了那健康的腎），而沒有仔細核對一下掛在手術台旁的X光片。這個悲慘的錯誤在手術之後立刻就發現了，但由於攸關協和醫院的聲譽，被當成『最高機密』歸檔。」對於這次醫療事故，病中的梁啟超知道得很清楚，但無力回天，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寒假結束後，林徽因和梁思成返回東北大學，又開始了緊張的教學生活。林徽因除了講授雕飾史外，還擔任英文課老師，工作十分繁忙。

一九二九年夏天，梁思成把他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同學陳植、董雋等，請到東北大學任教。梁思成、林徽因跟他們密切合作，相處融洽，把東北大學建築系辦得有聲有色，在全國有了一定聲望。

到了八月，林徽因生下一個女兒，取名再冰，以紀念號為「飲冰室主人」的祖父梁啟超。

這一年，梁思成和陳植等人成立了「營造事務所」，從事建築研究的同時，承攬建築工程。事務所一開張就接了兩個大項目，

一是修建吉林大學校舍，二是設計交通大學錦州分校校舍。林徽因不但一直參與這些設計，還和梁思成在一項「公共設計」中合作，設計了瀋陽郊區一座公園——肖何園。此外，他們還替瀋陽一些有錢的軍閥設計私宅。

這年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東北大學校長張學良徵求「東北大學校徽圖案」，林徽因應徵設計了「白山黑水」圖案，而且中獎，獲得四百元獎金。

正當他們的事業蓬勃發展的時候，由於工作繁重加上撫育小孩的辛苦，林徽因病倒了。經診斷，她患上了當時的難治之症——肺病，不得不經常臥床休息。而且當時東北時局混亂，形勢很不安寧。林徽因曾說：「當時東北時局不太穩定，各派勢力爭奪地盤。一到晚上經常有土匪出現（當地人稱為鬍子），他們多半從北部牧區下來。這種時候我們都不敢開燈，聽著他們的馬隊在屋外奔馳而過，那氣氛真是緊張。有時我們隔著窗子往外偷看，月光下鬍子們騎著駿馬，披著紅色的斗篷，奔馳而過，倒也十分羅曼蒂克。」這些都說明，林徽因該換一換生活環境了。





一九三〇年冬，徐志摩為了與胡適商定到北大任教一事，從上海來到北平。當他得知林徽因身體欠安時，便長途跋涉前往東北大學探望。當時正值寒冬，瀋陽天氣異常寒冷，加上醫療條件欠佳，徐志摩看到林徽因病情嚴重，便力勸她回北平治療，因為那兒的氣候稍暖，而且醫療條件也比瀋陽好。經過再三考慮，林徽因、梁思成採納了徐志摩的意見。

不久，梁思成把林徽因、女兒梁再冰，還有林徽因的母親一起安置在北總布胡同三號，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裡。林徽因打算這個寒假在北平治好病，來年春天再返回東北，她不想離開自己熱愛的建築事業。

一九三一年二月，徐志摩到北平教書，他原以為林徽因早已返回東北，但卻發現她和梁思成都還在北平，而且「瘦得像一對猴子」。尤其是林徽因，簡直讓人不忍多看。在給陸小曼的信中，徐志摩悲痛地說，林徽因的肺病已經深入到危險的地步，「這豈不是人生到此天道寧論？」看到這個樣子，徐志摩又勸說林徽因不要回東北，立即停止一切工作，到香山養病。梁思成聽從徐志摩的建議，把林徽因送到香山，然後獨自回到東北大學。

從三月到香山雙清別墅，九月回城裡，林徽因在香山共待了六個月。在此期間，醫生建議她盡量停止一切工作，精心養病。這真是難得的悠閒。放下了她的建築事業，加上養病時期獨有的心境，林徽因的詩情開始抑制不住地湧動起來。先後發表詩歌〈那一晚〉、〈誰愛這不息的變幻〉、〈仍然〉、〈激昂〉、〈一首桃花〉、〈山中一個夏夜〉、〈笑〉、〈深夜裡聽到樂聲〉、〈情願〉以及短篇小說〈箬〉。

林徽因情感細膩、感覺敏銳，早年就顯示出獨特的藝術才華，

對繪畫、戲劇等藝術形式有很深的理解。這些從年少時就開始培育的藝術素養，為林徽因從事詩歌創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對林徽因走上詩歌創作的道路，徐志摩的作用應該說最大了，早在倫敦學習期間，林徽因就受徐志摩影響，閱讀了大量浪漫主義詩人比如拜倫、雪萊、白朗寧、泰戈爾等人的作品，並深受感染。後來徐志摩苦戀林徽因，他的激情、詩意、才華都讓林徽因刻骨銘心，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林徽因的情感狀態和發展歷程，使其具有了別樣的豐富經歷，這些都催發著林徽因傑出的詩歌篇章的產生。

林徽因在香山養病期間，徐志摩常約朋友張奚若夫婦、沈從文、金岳霖等去看望她，陪她談天，藝術、人生、社會現實等等，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梁家的一位親戚，一九三一年的時候還是一個少女，回憶當年徐志摩的風采時說：「他的出現很戲劇性，穿了件錦緞長袍，脖子上圍一件細緻的英國羊毛圍巾。一副怪誕的組合！所有的眼睛都盯著他瞧。他的外表多少有幾分女性氣質，人卻熱情奔放，一出現就感染在場的所有人。」

徐志摩的到來無疑帶給林徽因極大的精神慰藉，而且，這位對林徽因一直抱有深厚的感情的詩人一有時間就為她作詩。情到深處，不能自己。比如〈山中〉：

庭院是一片靜，
聽市謠圍抱；
織成一片松影——
看當頭月好！

不知今夜山中，
是何等光景；
想也有月，有松，

有更深的靜。
 我想攀附月色，
 化一陣清風，
 吹墮群松春醉，
 去山中浮動；

吹下一針新碧，
 掉在你窗前；
 輕柔如同歎息——
 不驚你安眠！

還有〈你去〉這首詩，也是寫給林徽因的

你去，我也走，我們在此分手；
 你上那一條大路，你放心走，
 你看那街燈一直亮到天邊，
 你只消跟從這光明的直線！
 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著你：
 放輕些腳步，別教灰土揚起，
 我要認清你遠去的身影，
 直到距離使我認你不分明，
 再不然，我就叫響你的名字，
 不斷的提醒你，有我在這裡
 為消解荒街與深曉的荒涼，
 目送你歸去……

不，我自有主張，
 你不必為我憂慮；你走大路，
 我進這條小巷。你看那棵樹，

高抵著天，我走到那邊轉彎，
再過去是一片荒野的凌亂：
有深潭，有淺窪，半亮著止水，
在夜芒中像是分披的眼淚；
有石塊，有鉤刺脛踝的蔓草，
在期待過路人疏神時絆倒，
但你不必焦心，我有的是膽，
凶險的途程不能使我心寒。
等你走遠，我就大步向前，
這荒野有的是夜露的清鮮；
也不愁愁雲深裏，但求風動，
雲海裡便湧星斗的流涎；
更何況永遠照徹我的心底，
有那顆不夜的明珠，我愛——你！

此詩寫成之後，徐志摩致信林徽因，說：

我愁望著雲濤的天和泥濘的地，直擔心你們上山一路平安。到山上大家都安好否？我在記念。

我回家累得直挺在床上，像死人——也不知哪來的累。適之在午飯時說笑話，我照例照規矩把笑放上嘴邊，但那笑彷彿離嘴有半尺來遠，臉上的皮肉像是經過風臘，再不能活動！

下午忽然詩興發作，不斷的抽著煙，茶倒空了兩壺，在兩小時內，居然鑄得了一首。哲學家（指金岳霖——作者注）上來看見，端詳了十多分鐘，然後正色的說：“

It is one of your very best。”但哲學家關於美術作品只往往挑錯的東西來誇，因而，我還不敢自信，現在抄了去請教女詩人，敬祈指正！

雨下得凶，電話電燈會斷。我討得半根蠟，匍匐在桌上胡亂寫。……

思成恐怕也有些著涼，我保薦喝一大碗薑糖湯，妙藥也！寶寶老太都還高興否？我還牽記你家矮牆上的艷陽。此去歸來時難說完，敬祝

山中人「神仙生活」，快樂康強！

讀了徐志摩的這些書信、詩作，林徽因的心情自然難以平靜。有這麼一位才華橫溢的男子愛戀自己，不論怎麼說，也是人生的一件幸事。更何況，他們都知道兩人之間的愛情是不可能的，但還保有這麼真摯的友誼，的確難得。正巧，此時徐志摩在北京大學任教之餘，與陳夢家等人籌辦《詩刊》。他與朋友們一再鼓勵林徽因寫詩。正是有了這樣的「天時、地利、人和」，林徽因不甘寂寞，終於拿起筆，開始了詩歌創作。

梁從誡說：「香山的『雙清』也許是母親詩作的發祥之地。她留下來的最早的幾首詩都是那時在這裡寫成的。清靜幽深的山林，同大自然的親近，初次做母親的快樂，特別是北平朋友們的真摯友情，常使母親心裡充滿了寧靜的欣悅和溫情，也激起了她寫詩的靈感。從一九三一年春天，她開始發表自己的詩作。」

上面所列舉的林徽因的詩歌，大多是愛情詩，構思巧妙，意象生動，回味悠長。詩歌靈動飄逸、清新綺麗，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比如〈一首桃花〉：

桃花，
那一樹的嬌紅，
像是春說的一句話：
朵朵露凝的嬌艷，
是一些
玲瓏的字眼，
一瓣瓣的光致，
又是些

柔的勾的吐息；
含著笑，
在有意無意間
生姿的顧盼。
看，——
那一顫動在微風裡
她又留下，淡淡的，
在三月的薄唇邊，
一瞥，
一瞥多情的痕跡！

以桃花為意象，寫一位女性的嬌艷嫵媚，生動活潑，充滿詩情畫意。

又如〈笑〉一詩通過形象的描繪，把一位女性的笑寫得活靈活現、躍然紙上。讀者讀詩時，面前自然而然地會浮現出一張美麗的笑臉：

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
和唇邊渾圓的漩渦。

艷麗如同露珠，
朵朵的笑向
貝齒裡閃光裡躲。
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
水的映影，風的輕歌。

笑的是她惺忪的鬢發，
散亂的挨著她耳朵。
軟軟如同花影，
癢癢的甜蜜
湧進了你的心窩。
那是笑——詩的笑，畫的笑；
雲的留痕，浪的柔波。

林徽因還在詩歌裡表達愛而不能的傷感：比如〈深夜裡聽到樂聲〉：

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
輕彈著，
在這深夜，稠密的悲思。

我不禁頰邊泛上了紅，
靜聽著，
深夜裡弦子的生動。
一聲聽從我心底穿過，
忒淒涼
我懂得，但我怎能應和？

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樣，

太薄弱
是人們的美麗的想像。

除非在夢裡有這麼一天，
你和我
同來攀動那根希望的弦。

這樂聲是一種感召，一種紀念，輕柔細膩中蘊含著熱烈和真摯，這是來自性靈深處的詩情。在藝術建構上，這首詩也體現了音律美和建築美，兩長一短的構式，抑揚適度，往還復沓，餘音裊裊。整首詩像哀婉的歌聲，冷清地飄蕩在寂靜深夜，「我懂得，但我怎能應和？」

林徽因的詩歌在文學期刊上發表以後，引起了熱烈反應。陳夢家在〈新月詩選·序言〉中說：「渴望著更綺麗的詩篇的出現，對於林徽因初作的幾首詩表示我們酷愛的歡心。她的〈笑〉也是一首難得的好詩。」

一顆詩壇的新星正在升起。





一九三一年九月，經過半年的治療之後，林徽因的病情有了好轉，回到城裡。這時，梁思成離開東北大學，回到北平，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中國營造學社」是一個專門從事中國古代建築研究的機構，社址在故宮，其發起人是朱啟鈐。朱啟鈐一九一四年曾做過內務總長，一九一五年奉袁世凱之命修繕皇宮時，對營造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九一七年，他在江南圖書館發現《營造圖式》的抄本，便自籌資金，成立「中國營造學社」，自任社長。一九三〇年，他向「庚子賠款」的中華教育基金會申請經費補助，邀請林徽因和梁思成加入。梁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任營造學社校理。他們倆又開始了建築研究工作，並時常參加文化界的活動，生活過得忙碌而又充實。

然而，這段時間，徐志摩卻過得很不順心。與陸小曼結婚以後，他們定居上海，在這個花花世界，陸小曼很快就沉迷於奢華的生活中而不能自拔。她的開銷遠遠超出了徐志摩的經濟能力。在經濟的壓力下，徐志摩不得不經常來往於北平和上海之間，在多所大學任教，以滿足陸小曼的高額花費。為此，徐志摩曾多次勸說陸小曼，要她到北平生活，脫離上海這個能使人墮落糜爛的地方，然而陸小曼非但不聽，還催促徐志摩從事房地產生意來掙錢，兩人的爭吵越來越多。

十一月十二日，徐志摩回到上海的家中，沒想到，一到家便和陸小曼吵了起來。據王映霞說：「達夫告訴我志摩離上海那天與小曼吵架的情景。十一月十二日徐志摩從北京回到上海，苦口婆心的勸小曼戒鴉片。『眉，我愛你，深深地愛著你，所以勸你把鴉片煙戒掉，這對你身體有害。現在，你瘦得成什麼樣子，我看了，真傷心得很，我的眉啊！』良藥苦口，忠言逆耳。小曼聽了，大發雷霆，隨手把煙槍往徐志摩的臉上擲去。志摩趕忙躲開，幸未擊中，金絲眼鏡掉在地上，玻璃碎了……」徐志摩很生氣，當晚便離開家，跑到朋友家裡消解心中的煩悶。

十八日早晨，徐志摩離開上海，來到南京，當晚住在朋友何競武家裡，不一會兒，楊杏佛也應約前來會面。一見面，楊杏佛就問徐志摩：「為什麼這次回來不多住幾天就走？」徐志摩說：「徽因明天在協和禮堂為外國使節講中國的建築藝術，我已經答應她趕回去參加。」韓湘眉說：「Suppose something happens tomorrow，志摩!？」徐志摩笑著說：「你怕我死嗎？」「志摩」正經話，總是當心點好。司機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韓湘眉認真地說。就這樣，一直談到深夜，徐志摩、楊杏佛才離開，走到門口時，徐志摩還像兄長一樣，輕吻了韓湘眉的臉頰。

十九日上午，徐志摩搭乘中國航空公司的郵政班機「濟南號」飛往北平。午後二時，飛機飛到濟南上空時，因為霧氣濃重，飛機撞在白馬山上，當即墜入山谷，徐志摩遇難身亡，年僅三十五歲。在「濟南號」起飛之前，徐志摩曾給梁思成、林徽因發去電報，要他們下午三時派車到南苑機場接他，可是派去的汽車等到四點半還沒有等到他來。林徽因打電話給胡適，擔心可能發生什麼不測。

第二天，胡適看到了《晨報》上的消息：

京平北上機肇禍，昨在濟南墜落！機身全毀，乘客司機均燒死，天雨霧大誤觸關山。

〔濟南十九日專電〕十九日午後二時中國航空公司飛機由京飛平，飛行至濟南城南卅里黨家莊，因天雨霧大，誤觸關山山頂，當即墜落山下，本報記者前往調查，見機身全焚燬，僅餘空架，乘客一人，司機二人，全被燒死，血肉黑焦，莫可辨認，郵件被焚後，郵票彷彿可見，慘狀不忍睹。

胡適看了這報導後，斷定徐志摩出事了。他馬上打電話告知林徽因。接著，他又親自到中國航空公司詢問。當日十二時，胡適的判斷果然被證實。下午，林徽因、梁思成、張奚若、陳雪屏、孫大雨、錢端升、張慰慈、陶孟和等，都來到胡適家裡。林徽因神色淒婉，泣不成聲，張奚若則失聲慟哭。經過商議後，他們立即電告青島大學的楊振生，通報徐志摩遇難的消息，並委派梁思成、金岳霖、張奚若趕赴現場。林徽因、梁思成回到家後，立即趕製了一個用碧綠鐵樹葉和白花編成的徑尺大小的花圈，並由梁思成帶往濟南。

二十二日晨，梁思成等和從青島大學趕來的沈從文在濟南相會。他們一同到中國銀行，找到了冒雨到現場將徐志摩遺體裝殮的陳先生，打聽有關情況，然後他們又來到停放靈柩的福源庵的小廟裡，開棺看了徐志摩的遺容：「棺木裡靜靜地躺著的志摩，戴了一頂紅頂絨球青緞子瓜皮帽，帽前還嵌了一小方絲料燒成『帽正』，露出一個掩蓋不盡的額角，右額角上一個李子大斜洞，這顯然是他的致命傷。眼睛是微張的，他不願意死！鼻子略略發腫，想來是火灼灸的。門牙脫盡，額角上那個小洞，皆可說明是向前猛撞的結果。」

隨後，梁思成將他們夫婦特製的那個花圈，安置在棺蓋上。他還揀了「濟南」號飛機殘骸一塊小木板，以作紀念，這是林徽因和他商量過的。

下午五時，徐志摩的兒子年僅時三歲的徐積鏞和張幼儀的哥哥張嘉鑄從上海趕到濟南。晚上八時半，靈柩裝上了一輛敞篷車，運回上海，停放在萬國殯儀館。

十二月六日，上海文藝界人士在靜安寺設靈堂，追悼徐志摩。之後，徐志摩靈柩被運回硤石，葬於東山萬石岡。

十二月七日，林徽因在《晨報》上發表〈悼志摩〉一文，沉痛悼念作為父親和自己，也是梁啟超和梁思成兩代人的好友徐志摩。這篇感人至深的悼念文字，寫出了徐志摩的某些個性特點，也表達了林徽因的深沉悲痛：

十一月十九日我們的好朋友，許多人都愛戴的新詩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慘酷的，在飛機上遇險而死去。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針刺猛觸到許多朋友的心上，頓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哀慟的哽咽鎖住每一個人的嗓子。

志摩……死……誰曾將這兩個句子聯在一處想過！他是那樣活潑的一個人，那樣剛剛站在壯年的頂峰上的一個人。朋友們常常驚訝他的活動，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認真，誰又會想到他死？突然的，他闖出我們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遠的靜寂，不給我們一點預告，一點準備，或是一個最後希望的餘地。這種幾乎近於忍心的決絕，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現在那不能否認的事實，仍然無情地擋住我們面前。任憑我們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慘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夠仍然接觸到他原來的音容，事實是不會為體貼我們這悲念而有些須更改；而他也再不會為不忍我們這傷悼而有些須活動的可能！這難堪的永遠靜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殘酷處。

我們不迷信的，沒有宗教地望著這死的帷幕，更是絲毫沒有把握。張開口我們不會呼籲，閉上眼不會入夢，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邊沿，我們不能預期後會，對這死，我們只是永遠發怔，吞嚥枯澀的淚，待時間來剝削這哀慟的尖銳，痲結我們每次悲悼的創傷。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

許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適之先生家裡麼？但是除卻拭淚相對，默然圍坐外，誰也沒有主意，誰也不知有什麼話說，對這死！

誰也沒有主意，誰也沒有話說！事實不容我們安插任何的希望，情感不容我们不傷悼這突兀的不幸，理智又不容我們有超自然的幻想！默然相對，默然圍坐……而志摩則仍是死去沒有回頭，沒有音訊，永遠地不會回頭，永遠地不會再有音訊。

我們中間沒有絕對信命運之說的，但是對著這不測的人生，誰不感到驚異，對著那許多事實的痕跡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世事盡有定數？世事儘是偶然？對這永遠的疑問我們什麼時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在我們前邊展開的只是一堆堅實的事實：

「是的，他十九晨有電報來給我……」

「十九早晨，是的！說下午三點准到南苑，派車接……」

「電報是九時從南京機場發出的……」

「剛是他開始飛行以後所發……」

「派車接去了，等到四點半……說飛機沒有到……」

「沒有到……航空公司說濟南有霧……很大……」

只是一個鐘頭的差別；下午三時到南苑，濟南有霧！誰相

信就是這一個鐘頭中便可以這麼不同事實的發生，志摩，我的朋友！

他離乎的前一晚我仍見到，那時候他還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飛機改期過三次，他曾說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的。我和他同由一個茶會出來，在總布胡同口分手。在這茶會裡我們請的是為太平洋會議來的一個柏雷博士，因為他是志摩生平最愛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兒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慇懃；希望可以再從柏雷口中得些關於曼殊斐兒早年的影子，只因限於時間，我們茶後匆匆地便散了。晚上我有約會出去了，回來時很晚，聽差說他又來過，適遇我們夫婦剛走，他自己坐了一會，喝了一壺茶，在桌上寫了些字便走了。我到桌上一看，——

「定明早六時飛行，此去存亡不卜……」我怔住了，心中一陣不痛快，卻忙給他一個電話。

「你放心，」他說，「很穩當的，我還要留著生命看更偉大的事跡呢，哪能便死？……」

話雖這樣說，他卻已經死了整兩週了！

凡是志摩的朋友，我相信全懂得，死去他這樣一個朋友是怎麼一回事！現在這事實一天比一天更結實，更固定，更不容否認。志摩是死了，這個簡單慘酷的實際早又添上時間的色彩，一週，兩週，一直的增長下去……

我不該在這裡語無倫次的儘管呻吟我們做朋友的悲哀情緒。歸根說，讀者抱著我們文字看，也就是像志摩的請柏雷一樣，要從我們口裡再聽到關於志摩的一些事。這個我

明白，只怕我不能使你們滿意，因為他的事，動聽的，使青年人知道這裡有個不可多得的人格存在的，實在太多，決不是幾千字可以表達得完。誰也得承認像他這樣的一個人世間便不輕易有幾個的，無論在中國或是外國。

我認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時候他在倫敦經濟學院，尚未去康橋。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認識到影響他還學的狄更生先生。不用說他和我父親最談得來，雖然他們年歲上差別不算少，一見面之後便相互引為知己。他到康橋之後由狄更生介紹進了皇家學院，當時和他同學的有我姊丈溫君源寧。一直到最近兩月中源寧還常在說他當時的許多笑話，雖然說是笑話，那也是他對志摩最早的一個驚異的印象。志摩認真的詩情，絕不含有絲毫矯偽，他那種癡，那種孩子似的天真實能令人驚訝。源寧說，有一天他在校舍裡讀書，外邊下了傾盆大雨——惟是英倫那樣的島國才有的狂雨——忽然他聽到有人猛敲他的房門，外邊跳進一個被雨水淋得全濕的客人。不用說他便是志摩，一進門一把扯著源寧向外跑，說快來我們到橋上去等著。這一來把源寧怔住了，他問志摩等什麼在這大雨裡。志摩睜大了眼睛，孩子似的高興地說「看雨後的虹去」。源寧不止說他不去，並且勸志摩趁早將濕透的衣服換下，再穿上雨衣出去，英國的濕氣豈是兒戲，志摩不等他說完，一溜煙地自己跑了！

以後我好奇地曾問過志摩這故事的真確，他笑著點頭承認這全段故事的真實。我問：那麼下文呢，你立在橋上等了多久，並且看到虹了沒有？他說記不清但是他居然看到了虹。我詫異地打斷他對那虹的描寫，問他：怎麼他便知道，準會有虹的。他得意地笑答我說：「完全詩意的信仰！」

「完全詩意的信仰」，我可要在這裡哭了！也就是為這「詩意的信仰」他硬要借航空的方便達到他「想飛」的宿願！「飛機是很穩當的，」他說，「如果要出事那是我的命運！」他真對命運這樣完全詩意的信仰！

志摩我的朋友，死本來也不過是一個新的旅程，我們沒有到過的，不免過分地懷疑，死不定就比這生苦，「我們不能輕易斷定那一邊沒有陽光與人情的溫慰」，但是我前邊說過最難堪的是這永遠的靜寂。我們生在這沒有宗教的時代，對這死實在太沒有把握了。這以後許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會有一點點光明，除非我也有你那美麗的詩意的信仰！我個人的悲緒不竟又來擾亂我對他生前許多清晰的回憶，朋友們原諒。

詩人的志摩用不著我來多說，他那許多詩文便是估價他的天平。我們新詩的歷史才是這樣的短，恐怕他的判斷人尚在我們兒孫輩的中間。我要談的是詩人之外的志摩。人家說志摩的為人只是不經意的浪漫，志摩的詩全是抒情詩，這斷語從不認識他的人聽來可以說很公平，從他朋友們看來實在是對不起他。志摩是個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裡最精華的卻是他對人的同情，和藹，和優容；沒有一個人他對他不和藹，沒有一種人，他不能優容，沒有一種情感，他絕對地不能表同情。我不說瞭解，因為不是許多人愛說志摩最不瞭解人情麼？我說他的特點也就在這上頭。

我們尋常人就愛說瞭解，能瞭解的我們便同情，不瞭解的我們便很落漠乃至於酷刻。表同情於我們能瞭解的，我們以為很適當；不表同情於我們不能瞭解的，我們也認為很公平。志摩則不然，瞭解與不瞭解，他並沒有過分地誇

張，他只知道溫存，和平，體貼，只要他知道有感情的存在，無論出自何人，在何等情況之下，他理智上認為適當與否，他全能表幾分同情，他真能體會原諒他人與他自己不相同處。從不會刻薄地單支出嚴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諭凡是與他不同的人。他這樣的溫和，這樣的優容，真能使許多人慚愧，我可以忠實地說，至少他要比我們多數的人偉大許多；他覺得人類各種的情感動作全有它不同的，價值放大了的人類的眼光，同情是不該只限於我們劃定的範圍內。他是對的，朋友們，歸根說，我們能夠懂得幾個人，瞭解幾樁事，幾種情感？哪一樁事，哪一個人沒有多面的看法！為此說來志摩朋友之多，不是個可怪的事；凡是認得他的人不論深淺對他全有特殊的感情，也是極自然的結果。而反過來看他自己在他一生的過程中確是很少得著同情的。不止如此，他還曾為他的一點理想的愚誠幾次幾乎不見容於社會。但是他卻未曾為這個而鄙吝他給他人的同情心，他的性情，不曾為受了刺激而轉變刻薄暴戾過，誰能不承認他幾有超人的寬量。

志摩的最動人的特點，是他那不可信的純淨的天真，對他的理想的愚誠，對藝術欣賞的認真，體會情感的切實，全是難能可貴到極點。他站在雨中等虹，他感冒社會的大不諳爭他的戀愛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車到鄉間去拜哈代，他拋棄博士一類的引誘捲了書包到英國，只為要拜羅素做老師，他為了一種特異的境遇，一時特異的感動，從此在生命途中冒險，從此拋棄所有的舊業，只是嘗試幾行新詩——這幾年新詩嘗試的命運並不太令人踴躍，冷嘲熱罵只是家常便飯——他常能走幾里路去採幾莖花，費許多周折去看一個朋友說兩句話；這些，還有許多，都不是我們尋常能夠輕易瞭解的神秘。我說神秘，其實竟許是傻，是

癡！事實上他只是比我們認真，虔誠到傻氣，到癡！他愉快起來他的快樂的翅膀可以碰得到天，他憂傷起來，他的悲感是深得沒有底。尋常評價的衡量在他手裡失了效用，利害輕重他自有他的看法，純是藝術的感情的脫離尋常的原則，所以往常人常聽到朋友們說到他總愛帶著嗟歎的口吻說：「那是志摩，你又有什麼法子！」他真的是個怪人麼？朋友們，不，一點都不是，他只是比我們近情，近理，比我們熱誠，比我們天真，比我們對萬物都更有信仰，對神，對人，對靈，對自然，對藝術！

朋友們我們失掉的不只是一個朋友，一個詩人，我們丟掉的是個極難得可愛的人格。

至於他的作品全是抒情的麼？他的興趣只限於情感麼？更是不對。志摩的興趣是極廣泛的。就有幾件，說起來，不認得他的人便要奇怪。他早年很愛數學，他始終極喜歡天文，他對天上星宿的名字和部位就認得很多，最喜晝夜觀星，好幾次他坐火車都是帶著關於宇宙的科學的書。他曾經譯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寫過一篇關於相對論的東西登在《民鐸》雜誌上。他常向思成說笑：「任公先生的相對論的知識還是從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來的呢，因為他說他看過了許多關於愛因斯坦的哲學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今夏我在香山養病，他常來閒談，有一天談到他幼年上學的經過和美國克萊克大學兩年學經濟學的景況，我們不覺對笑了半天，後來他在他的《猛虎集》的「序」裡說了那麼一段。可是奇怪的！他不像許多天才，幼年裡上學，不是不及格，便是被斥退，他是常得優等的，聽說有一次康乃爾暑校裡一個極嚴的經濟學教授還寫了信去克萊克大學教授那裡恭維他的學生，

關於一門很難的功課。我不是為志摩在這裡誇張，因為事實上只有為了這樁事，今夏志摩自己便笑得不亦樂乎！此外他的興趣對於戲劇繪畫都極深濃，戲劇不用說，與詩文是那麼接近，他領略繪畫的天才也頗可觀，後期印象派的幾個畫家，他都有極精密的愛惡，對於文藝復興時代那幾位，他也很熟悉，他最愛鮑蒂切利和達文騫。自然他也常承認文人喜畫常是間接地受了別人論文的影響，他的，就受了法蘭（Roger Fry）和斐德（Walter Pater）的不少。對於建築審美他常常對思成和我道歉說：「太對不起，我的建築常識全是Ruskins那一套。」他知道我們是最討厭Ruskins的。但是為着一個古建的殘址，一塊石刻，他比任何人都熱心，都更能靜心領略。

他喜歡色彩，雖然他自己不會作畫，暑假裡他曾從杭州給我幾封信，他自己叫它們作「描寫的水彩畫」，他用英文極細緻地寫出西（邊？）桑田的顏色，每一份嫩綠，每一色鵝黃，他都仔細地觀察到。又有一次他望著我園裡一帶斷牆半晌不語，過後他告訴我說，他正在默默體會，想要描寫那牆上向晚的艷陽和剛剛入秋的籬蘿。

對於音樂，中西的他都愛好，不止愛好，他那種熱心便喚醒過北平一次——也許唯一的一次——對音樂的注意。誰也忘不了那一年，克拉斯拉到北平在「真光」拉一個多鐘頭的提琴。對舊劇他也算得「在行」，他最後在北平那幾天我們曾連連地同去聽好幾出戲，回家時我們討論的熱鬧，比任何劇評都誠懇都起勁。

誰相信這樣的一個人，這樣忠實於「生」的一個人，會這樣早地永遠地離開我們另投一個世界，永遠地靜寂下去，不再透些須聲息！

我不敢再往下寫，志摩若是有靈聽到比他年輕許多的一個小朋友拿著老聲老氣的語調談到他的為人不覺得不快麼？這裡我又來個極難堪的回憶，那一年他在這同一個的報紙上寫了那篇傷我父親慘故的文章，這夢幻似的人生轉了幾個彎，曾幾何時，卻輪到我在這風緊夜深裡握吊他的慘變。這是什麼人生？什麼風濤？什麼道路？志摩，你這最後的解脫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聰明，我該當羨慕你才是。

在追悼徐志摩之前，胡適和林徽因等人已經商定，設立徐志摩文學獎，建立徐志摩圖書館以及徐志摩紀念館，以作為對徐志摩的永久紀念。此外，他們還打算搜集徐志摩的遺文，出版徐志摩的文集，但在搜集徐志摩的文字時，林徽因和凌淑華發生了「康橋日記」的糾紛。

一九二五年三月，徐志摩辭去北京大學的教職，準備到歐洲旅行。行前，他將一個小提箱交給凌叔華保管，並對她說：「要是我不能回來的話，你得給我寫傳。這箱子裡面有你需要的材料。」

據說，箱子裡有部分文稿，徐志摩的兩三冊英文日記，還有陸小曼的兩本日記，這個小提箱一直放在凌叔華那兒，徐志摩遇難前一直沒有去取。

這裡所說的英文日記，是徐志摩在劍橋大學時寫的「康橋日記」。徐志摩遇難前，曾告訴林徽因說他的「康橋日記」放在凌叔華那兒，因而林徽因知道徐志摩的日記的下落。現在物是人非，林徽因非常想看看那些日記，那裡面應該詳細地記錄了徐志摩當時的所思所感，是瞭解徐志摩的重要資料，而且裡面肯定有大量是關於她自己的，林徽因的想法應是合情合理。

因而，林徽因請好友胡適出面向凌叔華要徐志摩的日記。在胡適的要求下，凌叔華把日記交給了胡適。十一月二十八日，胡適又把日記轉交給林徽因。可是林徽因拿到日記後卻發現裡面沒有「康橋日記」。顯然，凌叔華把它抽掉了。沒過幾天，凌叔華到林徽因家裡向她要徐志摩的書信，打算編成一本「志摩信札」。林徽因說信都在天津，大都是英文的，一時沒法給她。接著林徽因便問凌叔華：「聽說志摩的『康橋日記』在你那兒，能否借給我看看？」凌叔華聽了之後，很勉強地說可以。林徽因又說到她家裡去取，凌叔華說她下午不在家，改天吧。

十二月九日，林徽因到凌叔華家裡去拿信，但是沒見著凌叔華，只看見她留下的一封信：「昨歸遍找志摩日記不得。後檢自己當年日記，乃知志摩交我三本：兩小，一大。小者即在君處箱內，閱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滿寫的）未閱完，想來在字畫箱內（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書物皆堆疊成山，甚少機緣重為整理，日間得閒休當細檢一下，必可找出來閱。此兩日內，人事煩擾，大約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尋也。」林徽因看完信之後非常不滿，「氣得通宵沒有睡著」。

直到十二月十四日，凌叔華才將半本「康橋日記」拿給林徽因。林徽因看了之後更氣，搞不明白凌叔華究竟怎麼想的。她接連寫了幾封信給胡適，告訴他這一連串的事，而且還鄭重指出：「現在無論日記是誰裁去的，當中一段缺了是事實，她沒有坦白地說明了以前，對那幾句瞎話沒有相當解釋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會撕的，小曼尚在可問。）」

胡適得知這一情況之後，十二月二十八日寫信給凌叔華，要她把剩下的日記交給林徽因。他說：

昨始知你送徽因處的志摩日記只有半冊，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冊半留下作傳記或小說的材料了。

但我細想，這個辦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為私有秘寶，則餘人所藏也有各成為私有秘寶的危險。第三，朋友之中會因此發生意見，實為最大不幸，絕非死友所樂意。第四，你藏有此兩冊日記，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與孟和夫婦皆知道，徽因是你親自告訴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編的遺著略目，就註明你處存兩冊日記。昨天有人問我，我就說：「叔華送來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記都在那裡，我還沒有打開看。」所以我今天寫這信給你，請你把那兩冊日記交給我，我把這幾冊英文日記全付打字人打成三個副本，將來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給你做傳記材料。

請你給我一個回信。倘能把日記叫來人帶回，那就更好了。……

我知道你能諒解我的直言的用意，所以不會怪我。祝你好。

胡適說得很委婉，但又很嚴厲，凌叔華收到信後，不得不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托人把徐志摩「康橋日記」的另外半部分交給胡適，並附一封信：

適之：

外本璧還，包紙及繩仍舊樣，望查收。此事以後希望能如一朵烏雲飛過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則怎樣對得住那個愛和諧的長眠人！

你說我記憶不好，我也承認，不過不是這一次。這一次明明是一個像平常毫不用準備的人，說出話，行出事，也如

平常一樣，卻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地觀察指摘。這有備與無備分別大得很呢。算了，只當我今年流年不利罷了。我永遠未想到北京的風是這樣刺臉，土是這樣迷眼。你不留神，就許害一場病。這樣也好，省得總依戀北京。問你們大家好。

即日

凌叔華在信中表達了對林徽因和胡適的不滿。可是，之所以有這場「官司」，原因還在凌叔華自己不爽快。她交出日記，一拖再拖，讓大家都都不高興。但是，即使是這次交給胡適的半本，仍然有四頁被裁掉，胡適看了之後很是不滿，認為凌叔華一錯再錯，不知悔改。他只好把這仍然殘缺的日記交給林徽因，林徽因的心情可想而知。

半個世紀之後，凌叔華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和一九八三年五月七日致陳從周的信中舊事重提，她還是滿腹怨言：

不意在他飛行喪生的後幾日，在胡適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鬧著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來公開，我說可以交給小曼保管，但胡幫著林徽因一群人要求我交出來（大約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戀愛日記公開了，對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適向我要求交出來）。我說我應交小曼，但胡適說不必。他們人多勢眾，我沒法拒絕，只好原封交與胡適。可惜裡面不少稿子及日記，世人沒見過面的，都埋沒或遺失了。

至於志摩墜機後，由適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說要為志摩整理出書紀念。我因想到箱內有小曼私人日記兩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記二三本。他既然說過不要隨便給人看，他信託我，所以交我代存，並且重托過我為他寫「傳

記」。為了這些原因，同時我知道如我交胡適，他那邊天天有朋友去談志摩的事，這些日記恐將滋事生非了。因為小曼日記內（兩本）也常記一些是是非非，且對人無一點包容。想到這一點（彼時小曼對我十分親熱，她常說人家叔華就不那樣想，裡面當然也有褒貶徽因的日記），我回信給胡適，說我只能把八寶箱交給他，要求他送給陸小曼。以後他真的拿走了。

信中，凌叔華除了表達對林徽因等人的不滿外，並沒有交待那裁去的四頁的下落。據卞之琳稱，林徽因將徐志摩的兩本日記一直保存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刻。後來，日記焚於「文革」中。

這件事在北平鬧得滿城風雨。胡適在日記中說：「為了志摩的半冊日記，北京鬧得滿城風雨，鬧得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寧。」（胡適寫日記時在上海）

而在這糾紛中，受到刺激和傷害最大的是林徽因。因為當時盛傳林徽因要「康橋日記」的原因是裡面有不利於她的記錄，怕日記曝光後對她造成不良影響。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林徽因在給胡適的信中說：

實說，我不會也以詩人的美諛為榮，也不會以被人戀愛為辱。我永是「我」，被詩人恭維了也不會增美增能。有過一段不幸的曲折的舊歷史也沒有什麼可慚。（我只是要讀讀那日記，給我是種滿足，好奇心滿足，回味這古怪的世事，紀信老朋而已。）

我覺得這樁事人事方面看來真不幸，精神方面看來這樁事或為造成志摩為詩人的原因而也給我不少人格上知識上磨練修養的幫助，志摩 in a way 從某方面不悔他有這一段苦

痛歷史，我覺得我的一生至少沒有太墮入凡俗的滿足也不算一樁壞事，志摩警醒了我，他變成一種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或難過，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我自己的倔強，我也不慚愧。

我的教育是舊的，我變不出什麼新的人來，我只要「對得起」人——爹娘、丈夫（一個愛我的人，待我極好的人）、兒子、家族等等，後來更要對得起另一個愛我的人，我自己有時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為難。前幾年不管對得起他不，倒容易——現在結果，也許我誰都沒有對得起，您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當年紀，也沒有什麼成就，眼看得機會愈少——我是個興奮type 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and master stroke，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煉的人。現在身體也不好，家常的負擔也繁重，真是怕從此平庸處世，做妻生存的過一世！我禁不住傷心起來。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對於我，我難過極了。

這幾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著，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事實上是太不可能。也許那就是我不夠愛他的緣故，也就是我愛我現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確證。志摩也承認過這話。

在一連串的刺激下，加上工作家務的勞累，林徽因的肺病復發，她又倒下了。在給胡適的信中她說：

日前，人覺得甚病不大動得了，後來趕了幾日夜，兩三處工程圖案，愈弄得人困馬乏。

上星期起到現在一連走了幾天協和檢查身體，消息大不可人，醫生和思成又都皺開眉頭！看來我的病倒進展了些，醫生還在商量根本收拾我的辦法。……

身體情形如此，心緒更不見佳，事情應著手的也復不少，甚想在最近期間能夠一晤談，將志摩幾本日記事總括籌個辦法。

據我意見來看，此幾本日記，英文原文並不算好，年輕得厲害，將來與他「整傳」大有補助處故甚多，單印出來在英文文學上價值並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兩本中文字比他後來的作品書札差得很遠），並且關係人個個都活著，也極不便，一時只是收儲保存問題。

志摩作品中，詩已差不多全印出，散文和信札大概是目前最要緊的問題，不知近來有人辦理此事否？「傳」不「傳」的，我相信志摩的可愛的人格永遠會在人們記憶裡發亮的，暫時也沒有趕緊（的）必要。至多慢慢搜集材料為將來的方便而已。

林徽因的處理態度很冷靜，她主要從徐志摩日記的文學價值，以及對現在的影響來判斷這些文字到底適不適合出版。胡適也同意她的看法，暫不公開發表徐志摩的日記。這件事總算告一段落。

對於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間的感情，梁從誡談了自己的看法：

母親寫作新詩，開始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過徐志摩的影響和啓蒙。她同徐志摩的交往，是過去文壇上許多人都知道，卻又訛傳很多的一段舊事。在我和姊姊長大後，母